

A Study on the Cross-Linguistic Writing of Female Images in *Desert R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CUI Wenjuan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8, 2025

Accepted: March 10,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CUI Wenjuan. (2025). A Study on the Cross-Linguistic Writing of Female Images in *Desert R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052–05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07>

Abstract: In a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the imperative extends beyond merely presenting Chinese narratives to fostering their acceptance, comprehension, and validation on a global scale. Xue Mo's *Desert Rites*, a seminal 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portrays the struggles of farmers in the Longxi region, a pivotal loc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privation. The narrative's depi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self-redemptive aspirations offer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ir lived realities, imbuing the work with profound humanistic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esert Rites* through the lens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zing its content, discourse, and setting across linguistic boundaries. It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work's reception by reader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semination and translation. This approach aims to identify strategies for th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inherent cultural meanings.

Keywords: empathy communication; *Desert rites*; vernacular literature; femininity; translangualism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CUI Wenjuan is a 2025 graduate studen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encompas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CWJ9906@163.com.

共情傳播視域下《大漠祭》中女性形象的 跨語際書寫研究

崔文娟

寧波大學

摘要：在當前風雲變幻、日新月異的世界中，我們已不再局限於向世界介紹中國故事，更應讓世界接受中國故事，理解中國文化，認同中國內涵。著名作家雪漠的《大漠祭》作為當代中國鄉土文學的典範，描寫了絲綢之路必經之地——隴西地區的農民在貧乏的物質、精神生活與命運抗爭的一生，其中女性群體的自我救贖式理想更是與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反照，作品承載著深厚人文內涵與文學審美意蘊。目前，《大漠祭》已實現了多語種譯介與傳播，從共情傳播理論出發研究英譯本跨語際書寫的內容、話語、場景，探索作品被異文化讀者接受的可能性，厘清傳播與譯介的關係，有利於找出讓中文作品及其內涵得到外譯、可持續傳播的策略。

關鍵詞：共情傳播；《大漠祭》；鄉土文學；女性；跨語際

引言

長篇小說《大漠祭》是我國著名作家雪漠的主要作品，是「大漠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家用十二年時間將對於西部農村的關照傾注其中，不僅屢次入圍「茅盾文學獎」，也蟬聯了六年敦煌文藝獎及其他重要獎項，是我國西部鄉土文學作品的典範。這部作品內容充實，真實再現了當代我國西部農村的生活風貌，具有深刻的藝術意蘊和強大的生命力，同時蘊含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

雪漠出生於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的一個貧苦農村，艱難的生活環境使得雪漠發奮學習，書籍是其精神食糧，奠基了其文學素養；生活經歷是其創作背景，賦予了作品獨特價值。除了以自身經歷出發，作者在撰寫《大漠祭》之前在原武威市教育委員會工作，任教研員兼《武威教育報》編輯的雪漠在實地考察采風，他沿著祁連山，風餐露宿，走莊訪戶，搜集民風民俗，用雙腳在涼州大地上勾勒出寫作脈絡。不僅如此，《大漠祭》也經過了作者多次修改，對於作品品質的高要求催生了雪漠的煩惱，雪漠以苦行僧標準禪修自己，體悟文學與人生，也將禪學精神灌入作品之中，最終重寫出《大漠祭》。

《大漠祭》講述了中國西部隴西地區貧苦農民的艱難生存，尤其突出女性在傳統鄉土倫理中的悲苦命運。通過描繪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與困境，雪漠不僅展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還通過女性角色的掙扎與反思揭示了性別、文化與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並非單一的弱者，而是複雜且具抗爭精神的存在。例如，蘭蘭和瑩兒的命運雖然充滿不幸，但她們內心的堅韌與對改變命運的渴望展現了自我救贖的力量。翻譯過程中，這些情感的傳遞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向外國讀者展示這些女性形象時，譯者如何通過「移情」的方式確保情感的準確傳達，是該研究的核心問題。

一、情感書寫與女性形象

《大漠祭》文本的構思來源於作者的真實經歷，故事的地域背景是我國甘肅省。情感似乎並不是小說的

主題,作者並沒有如傳統小說一般在敘事中小說以積極的語調歌頌、褒揚什麼,也沒有以灰暗的筆觸鞭笞什麼,而是以平實、幽默的語言再現了整個時空中的人與景。在這樣的描寫之下,作者與譯者之「情」投射於小說人物之中,故事的展開都是「情」在推動,「情感」成為了小說的根基。小說以老順一家為主要人物,講述了一群以種地為生的農民在不能滿足溫飽的情況下,被多種煩心事叨擾。例如,大兒子憨頭的媳婦兒——瑩兒,雖容貌魅力,卻因疾病沒有生育能力,甚至諱疾忌醫後釀成了癌症,最後又因經濟能力不支持「人情禮節」而抱憾離世;二兒子猛子沒有足夠的「老婆本」,便跟村裏的寡婦苟合;小兒子靈官高中畢業就與瑩兒生出情愫,受苦與欲望之中,最後離開家鄉;為能使憨頭換來媳婦,女兒蘭蘭離開本村,來到陌生的外村,卻未曾受過婆家待見,深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①。

其中,作者重點敘寫了在這片經濟與思想都落後,資訊又閉塞的土地上不一般的倫理觀念和在這種倫理觀念下的女性生存困境,作者並未單獨將女性作為小說的主要人物,通過其他人物與女性的互動,讀者們都能在文中讀出她們悲苦命運的根源,讀出現代社會女性地位的進步。雪漠細緻刻畫了我國農民的思想,用最樸素簡單又不乏幽默感的文字,速寫了我國西部農民的特徵,勾勒出一幅當時極其困苦的西部生活畫卷。作為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其語言平實質樸,精神內涵豐富。

二、翻譯中「移情」機制

「共情」(empathy)本是一個源於心理學的概念,指的是對他人所處境遇和經歷的同步理解和相應的回饋,不只是抽象的情緒本身,而是一種先天的能力。^②基於此,不同民族、團體等之間出於該能力做出的回饋,將能緩和矛盾、消除誤解。對於跨文化傳播來說,不同文化主體的交流與互動,在「共情」的加持下能事半功倍。「共情」指身臨其境地去體驗對方的心理空間,主動地從他者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問題,包括「這些思考所產生的情感和非情感的結果」。

共情與傳播融合,成為了當下人們解讀人、資訊、媒介及文化現實的另一種視角。易言之,共情傳播涉及到多種文化、多種因素、多種層級、多種傳播語境,共情能力的提升依賴於對共情文化較全面的考察。近年來,「共情傳播」成為國際傳播學界和業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共情概念引入傳播學領域,為國際傳播注入了新的理論血液。對外傳播的過程不僅是資訊的傳播與知識的分享,也是跨文化的情感傳播與溝通,後者的良好互動對前者可以起到積極作用,促進資訊知識的同步理解。^③在共情傳播的文化傳遞方式下,人或團體能夠擁有近似的精神體驗而組成共同體。注重構建情感共同體、塑造共同的情感體驗,有助於突破跨文化傳播中的資訊交流障礙,促進文化主體之間的互動。^④同時,這種方式能夠整合社會資源、增強社會認同感。無論如何,在國際傳播中,也要謹慎使用,將其發揮最大功能,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話語體系添磚加瓦,進一步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與影響力。

無獨有偶,文學作品的「走出去」也需要運用傳播的機制。共情文化並非外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從至聖先師的「仁愛之心」到亞聖的「惻隱之心」,到宋儒的「蓄草」而感懷「四時佳興與人同」,皆揭示了傳統中國重視至善,倫理肯定人道與天道的有機連續性和相互依存性。從漢語傳播到他國語言,翻譯中的語言也有其「移情」現象。對於文學翻譯,尤其是小說,譯者只有真正體會人物對話背後的深層次心理,才能理解為其服務的修辭手法,文本風格與譯文的語言選擇都基於此而產出。^⑤譯者需感悟作家的或原作所展現精神,模擬作家的審美定勢,最終把感情「外化」而移入到譯作的語言當中。在此也可發現,研究翻譯文本就可以反推譯者翻譯的過程。譯本的語言,作為文體的一種,情感文體學領域常常通過心智解讀(讀者推理人物動機的過程中想其所感,想其所感)、仿擬(讀者進入角色,置於敘事中,仿擬故事中人物經歷,認清人物行為和動機)與建模(想像與推理兼具,全面構建人物心智模型)三方面去探究情感在文本中的體現。因此,筆者

通過以上方式,探尋《大漠祭》譯本中的刻畫女性形象時的「移情」,從而厘清女性形象的跨語際書寫路徑。

三、《大漠祭》女性形象書寫的「移情」路徑

《大漠祭》作為最新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典範之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交流實踐中,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通過富有感染力和說服力的內容,多視角、多層次地解讀中國故事深刻內涵和長遠意義。共情傳播中的核心「情感」指導著我們對外要以「動之以情」的手段引發外國讀者的情感共振。^⑥人與人樸素的距離拉近建立在對國際社會熱門話題的關注,以及對那些能夠引發共鳴的價值理念的熱議,《大漠祭》中對女性形象的關注是女性主義的生動體現。在跨文化、跨語際的文學傳播過程中,筆者認為我們應從內容選擇、話語書寫、場景構建三方面入手研究。^⑦

(一) 內容選擇

從國際傳播的視角來看,增強其他國家民眾對我國故事,尤其是民族故事的欣賞,應從深刻把握國外讀者的需求、習慣和心理等方面入手。在對外傳播中,應甄選優質傳播內容,我們應傳播能強烈引起國外讀者體驗共鳴的文本,而不是「演獨角戲」,而是要真正觸動對方。跨文化傳播的難點是文化、語境的差異性,破除難點的關鍵是發現其共性^⑧,情感基因是存在共性的,例如「愛」是共情的基礎,共情的愛包含了人本身的愛,他人的愛、家人的愛、伴侶之間的愛,同樣包含了對自然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對可愛事物的喜愛等等。從文本來看,《大漠祭》的主題中包含著鄉土倫理,而這倫理就源於「愛」,無論是家人間傳統延續的愛、異性間扭曲或被壓抑的愛,女性的命運也在這「愛」之中發生轉折。從文本外部看,作者與譯者對女性的「重構之愛」更是打動讀者之處。在以男性為中心並物質、精神雙重匱乏的社會中,女性受到來自生存、男權、舊文化觀念的多重壓制,主要女性形象始終以淳樸、善良、溫柔、忍辱的悲苦形象出現,^⑨苟延殘喘,在身心雙重苦痛下維持生命。作者描寫的故事並不是始終描寫女性的悲慘遭遇,也刻畫女性的自我救贖過程。譯者在英譯本中的翻譯策略也體現出對女性積極樂觀的強調,例如小說中蘭蘭和瑩兒一樣換親給鄰村的白福,婚後因生了女兒被白福家暴、被婆婆欺負甚至被同為女性卻長期處於男權之下的母親數落,在如此的背景下,蘭蘭無力地反抗,她在引子死後、懷著孕一頭撞向八仙桌,第二次反抗是提出離婚和白福一家人抗爭到底。

In the past Lanlan would rather be beaten to death than run away, for she had not wanted to be a laughingstock among village women. It was different today, now that she had made up her mind.

譯者將原文的「死了心」,原文中死的是繼續過日子的心,翻譯為下定決心,便於讀者理解她的行為,譯者在譯文中凸顯了女性在苦難下迸發出的力量。因此譯者與譯者重構的女性形象,並不是始終如一的卑微與隱忍,她們也有內在隱性的反抗。作者通過反映鄉村女性悲苦命運的同時,也彰顯著鄉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反抗的現代精神,契合世界各地區人群的共同價值觀。以「愛」為核心的國際傳播往往能取得較好效果。愛是人類共同的需要,是共情的基礎和動力。因此跨文化傳播並不僅僅強調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是努力追求實現通過資訊的溝通交流彌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間的文化溝壑。^⑩

除此之外,「異質性」與「民族性」是中國文學受海外喜愛的特點,「求異」是外國讀者較為普遍的心理與認知需求。《大漠祭》對於國外讀者而言,橫向看,有文化與語言的差異性。小說本身的故事地理位置處於中國西部的甘肅省,自古以來便是中西方關注的焦點。從絲綢之路必經的重地,到如今部分西方媒體並不



真實、客觀地記錄中國西部形象，帶著厚重歷史的鄉土始終是被關注的對象。作者刻畫的故事展現西部地區獨特的地域風情，是外國讀者所好奇的中國農村故事，譯者翻譯的譯本保留大量的方言、俚語、民歌的直譯或音譯也是為了延續其本土性。例如故事中裏面提到了算命的「八字」，八字是中國獨有的一種傳統文化，譯者譯出時，翻譯成拼音 *ba zi*，保留其鄉土風情。

（二）話語書寫

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自我與他者是兩個重要的核心命題。他者的存在是主體塑造個體文化身份、建構自我意義的必備要素。換言之，個體需要從他者的角度認識問題，通過與他者的交流和互動進行自我審視和反思，從而在客觀理性中增進理解與共識。^⑩《大漠祭》作品的「他者」代表是作者和譯者。作者與小說故事有著極其相似的生活經歷，曾身處於接近小說故事的真實背景之中，書寫的話語樸素凝練、富有生活性，沒有任何虛假的編造，也不是單純靠新奇的故事取悅讀者，這使得讀者易獲得一種親切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盡可能保持文章的口語化與可讀性。例如，當癩五爺提到「換女人」時，譯者的翻譯如下：

That's right. Ten thousand. I tell you, I couldn't even dream about that much. In the old days, a bushel of wheat could buy you a wife.

譯者將癩五爺的「換」改成了「buy」，更直接地表達出這不是簡單的交換，便於讀者理解。同時，把女性當物品去買，與讀者目前的認知產生較大的差距，便於讀者當時女性被物化的社會背景，體會文學反映的時代洪流中女性地位的變遷。但當作者在若干年後、經歷禪修之後重寫故事時，已擁有了新的文化理念，獨立於作品本身，屬於故事的「他者」，對作品帶著現代的審視，紮根於鄉土的雪漠他對土地有著一種深沉的思考與理解，並時時流露出具有強烈鄉土意識的價值判斷。如作者本人所說，他的小說並不是直接描寫現實世界，而是通過一個外殼像現實、內部像精神的世界來表達其觀念，這種組成方式更有哲學意義。雪漠後期的小說的精神更趨多元化，帶有濃重的意象、魔幻色彩。就從題目中看，「大漠」便象徵著一種殘酷和蒼涼，有朦朧神秘之意，和在綿延的枯燥沙漠中「黃土厚土」裏蘊藏著的生命力，比如《大漠祭》中兔子糟蹋糧食、鷹捉兔子等，無處不在體現著女性生存環境的困苦。譯者將「大漠祭」翻譯為 *Desert Rites*^⑪ 正是賦予了其儀式般的神秘感。文中關於「孽緣」，譯者翻譯如下：

It's what's known as a karmic hurdle. Sometimes it is out in the open, sometimes not, but it is inescapable.

此處，譯者將「孽緣」翻譯成 *karmic hurdle*，這充分體現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karmic* 源於英文單詞 *karma*，對應的中文意思是因果報應或業力，佛教常用的宗教術語。^⑫ 而此處故事的「孽緣」是猛子和雙福的妻子偷奸被抓，老順蒙羞後請神婆消災時神婆的說法，從這更能體現出時代、社會背景中對於女性的輿論壓迫。魔幻主義是二十世紀中期盛行於拉美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對於西方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因此沿襲甚至誇張這層神秘色彩，更能拉近讀者與文本、故事的距離。

作者雪漠通過主動地、積極地參與、舉辦國外研討會，搭建全媒體互聯網平臺，使得其在海外有了一定知名度，而譯者本身作為西方人，在他者視角下講述、傳播的中國故事，意味著更公正客觀，易為外國讀者所接受，創造性翻譯的過程也是譯者用母語在小範圍寫作的過程，英譯本的英語用語更流暢。關於對女性的「忌諱」一段，譯者翻譯如下：

Women were a taboo at well sites. He had heard that wells at several Beixiang villages had collapsed midway through the drilling process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women, whose bodies, it was believed, were not clean, especially during their menstrual periods. That offended the earth god, who safeguarded the work of drilling wells.

譯者從用宗教意義上的詞語 taboo 來譯原文本中的「忌諱」,更進一步體現其作為西方人已對故事中貶低女性的背景有所認識並強調這種忌諱如宗教般嚴格,其後又用口語化的 offend 說明中文中的「沖」之意,便於讀者理解,而總體都是在以其他者視角受異文化衝擊後的隱性觀點表達。

以他者視角進行跨文化傳播是促進文化理解的最佳方式之一,這是因為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向灌輸難以使得國外受眾真正信服,甚至產生對抗性解碼。因此,基於國別屬性,外國譯者譯中國作品天然適合成為國外民眾瞭解真實中國故事的橋樑。在此,他者的概念需要跳脫固有的狹隘思維,不僅從地理距離,更從文化距離的遠近來理解他者。^⑭

(三) 場景構建

儘管由於地域空間的限制,國際傳播無法真正做到與每一個受眾身處同一個地理空間,但是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受眾的在場感,幫助其進一步理解其中傳遞的價值觀。^⑮共情的形成需要一個大的環境條件,即情境。潛在的相同或相似的情緒情感需要一個身體共在的情境或場合進行聚合或展現。從文本角度,《大漠祭》的整體生態環境、時代背景、人物動作語言神態等的描寫,譯者對原作者的保留與創造性翻譯,都使得讀者能夠身臨作品之中。《大漠祭》中作家用很多篇幅描繪了無比廣袤雄奇的浩瀚大漠景象。除了荒涼外,作者在其中也灌注了對故土的奇異的審美:「太陽到了正西,懸在了一道高大的沙梁上,紅。因為無從,歡煙直上空中,不是那種筆直,而是蜿蜒如絲線嫋嫋騰空,仿佛空中有只無形的手輕輕抖動著,往上牽這條灰色的線。到很高的地方,火線便消失了,化為一層層均勻的霧,四面的沙穀沙梁便罩在輕煙之中了。粉紅的落日,薄霧似的炊煙,明暗相間的沙嶺,還有那一浪高似一浪滾滾而去的沙濤,構成了一幅奇幻的畫面。」^⑯與作者筆下的女性一樣,悲哀卻有其柔韌的力量,仿佛在說明女性在這種如牢籠般社會背景下難掙脫的無力感和她們只能踏上別樣救贖之路的可能性。文中有一處引弟父親丟棄她的場景,譯者翻譯如下:

The bright red rays of light above the hill were swallowed up by the night... The crescent moon was gone and the sky was darker than the blackened bottom of Grandma's pot.

譯者將「光也叫夜氣淹了」中的「淹」譯為 swallow up(吞沒),便於外國讀者理解,仿擬代入引弟,充分能夠共情一位幼女在昏暗孤寂中的「恐懼」。譯者保留的「奶奶灶火了的鍋底」,是鄉土意象的體現和兒童純真的心理展現,引起讀者新奇感的同時悲憫幼女遭遇。

作品情境的構建少不了敘事情節。作者與譯者融合作用下的《大漠祭》英譯本裏,保留了原作者的多人物出現,沒有等級明確的情節大小之分或人物主次之分,除了女性角色也有眾多男性角色,情節較為簡單,從日常生活瑣事入手,卻充滿了矛盾與衝突,賦予了人物真實情感。即便沒有中心人物和代表性、高潮性故事,但讀者在整體閱讀後都會得出一個關於「女性成長」的類似主題,是讀者能夠在通過語言、聲音等近似真實生活的場景中體會女性的艱難,產生對較弱者的同情與反抗者的敬佩,同時能夠代入與自身價值觀相同的人物身中,體會作者和譯者想要表達的人文主義價值。

四、《大漠祭》英譯的共情傳播效果

雪漠的作品除了被國內讀者接受,在海外也有著眾多讀者,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外熱內冷」,因其獨特的鄉土風情、深厚的文學意蘊和哲學內涵,《大漠祭》在國外受到了大量讀者的喜愛。小說使用了各種熟語、俚語、歇後語和俗語等方言形式,這本構成外國讀者的理解障礙。但著名譯者葛浩文在保留原著的原汁原味的同時,關照外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提高了作品可讀性。而這其中,最能彌合文化溝壑的便是情感,作者「移情」小說人物,譯者「移情」作者與譯本,讀者又在譯本中「共情」。如此一來,能在保留原著的語言情境與含義的同時,又可避免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從而助力讀者從原作者和譯者所運用的語言當中,深切地感悟到原著的精華所在以及那深邃悠遠的意境之美。

結語

本文分析《大漠祭》英譯本,探索跨語際傳播過程中,譯者所處理的文本如何對小說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傳遞和再造,如何使讀者產生共鳴。共情理論為文學海外傳播與譯介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我們應繼續採用廣大海外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喚醒國外受眾的「共情」心理;充分運用「共情」機制迅速觸達具有不同閱讀需求的海外受眾,實現共情傳播的最大化。在平等、互動的溝通與交流之中,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實現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群體民眾之間的共鳴與有效交流。

注釋

- ① 郭靜懿:《探析〈大漠祭〉中的概念隱喻現象》,《新紀實》,2022年第3期,頁48-50。
- ② 鄭敏:《共情理論視域下出版業講好中國故事的三個關鍵關係》,《中國出版》,2021年第9期,頁34-36。
- ③④ 郝雨,馬宇涵:《基於共情理念的中國新敘事——出版業對外傳播的一個深度理念問題》,《出版發行研究》,2022年第8期,頁65-70。
- ⑤ 李明,盧紅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小說翻譯中的移情與表達》,《外國語文研究》,2017年第1期,頁68-77。
- ⑥⑦ 鄭敏:《共情理論視域下出版業講好中國故事的三個關鍵關係》,《中國出版》,2021年第9期,頁34-36。
- ⑧⑩⑪⑭ 林小榆,陳純:《中國故事跨文化共情傳播的可行性分析》,《國際公關》,2023年第19期,頁158-160。
- ⑨ 甘秀萍:《雪漠小說的鄉村倫理敘事研究》,2021年西南大學碩士論文。
- ⑫ Xuemo. *Desert rites*, trans Howard Goldblatt, Sylvia Li-chun Lin.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
- ⑬ 潘雲昊:《闡釋學翻譯理論視角下雪漠小說〈大漠祭〉英譯本譯者主體性研究》,2019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頁24。
- ⑮ 劉澄,冉育華:《共情傳播視域下中國核心術語國際影響力提升新思考》,《對外傳播》,2023年第6期,頁31-34。
- ⑯ 陳岩:《從〈大漠祭〉看雪漠小說》,2011年蘭州大學碩士論文,頁28。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